

深入浅出，梳理一条通往儒家思想殿堂的路径。

安鲁东◎著



理学的脉络

初学者先读本书，
循其路径，

再读五经四书、读朱熹、读王阳明，
能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助读者，得窥圣门的「室家之好」。

安鲁东◎著



理学的脉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学的脉络 / 安鲁东著. 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334-7344-0

I. ①理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理学—思想史—研究
中国 IV. ① B244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5613 号

理学的脉络

安鲁东 著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01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010-62027445

发行部电话: 010-62024258 0591-87115073)

出版人 黄旭

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(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19号楼 邮编: 350002)

开本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18.5

字数 256 千字

插页 1

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4-7344-0

定价 45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社出版科(电话: 0591-83726019)调换。

前言 理学，一门被严重误解了的学问

近些年国学很热，却是虚热。热的主要是小术、小道、小学。小术方面，如算命打卦、中医中药、古乐古戏、书法国画等；小道方面，如修佛、学道等；小学方面，如一些机构教人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等。

大家当然知道国学的核心是儒学，许多人主张读经，但他们有种奇怪的观点，认为读经就应该读纯正的先秦原典，回到孔子那里去。

杨庆中教授的话或许具有广泛代表性，他说：“一谈到儒学，人们或许马上会想到孔子，想到先秦。其实，近代儒学的衰落，乃是就儒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——理学而言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谈到的儒学的衰落，是理学的衰落。五四新文化运动，虽然高擎‘打倒孔家店’的旗帜，但具体批判的内容则是‘吃人的理教’‘假道学’等等，这些都是针对理学而言的。所以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，是理学的衰落，是理学这种理论形态在近代与西方交手时处于下风。”^①

其实，这是一种浅薄的误判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打“孔家店”，实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；他们按理当时应该直接打“朱家店”，因为孔子毕竟远了，当时笼罩神州大地的思想学术，是经过朱熹、王阳明等人改造过的新儒学——理学。

^① 见 2013 年 6 月 21 日《中国文化报》。

理学自南宋理宗时代入官学，经元、明、清三代，至民国已历近七百年。期间，有约六百年的时间，朱熹注的经书，是朝廷科考指定的唯一教材，其受崇奉及影响社会的程度可想而知。

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不直接拉朱夫子出来批，反而去找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的晦气，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

一个方面，他们认为，“孔家店”是理学的总后台，拆了总后台，朱熹的前门店自然也会跟着倒塌。

另一方面，直接提打倒理学，他们底气不足。

他们否定儒学的缘由，是判定儒学已经腐朽了、僵死了，成为了中国社会拿来西方科学与民主制度的障碍。但是，这种话他们不敢公开说出口，鲁迅高喊打倒“吃人的礼教”，而不像杨庆中先生那样直接说打倒“吃人的理教”，不是笔误，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。

当时他们不能不顾虑这样两件事实。

一是清末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一班理学家，不仅奋起镇压太平天国，中兴了清朝；而且还积极发起洋务运动，师夷长技以制夷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。他们虽然最终没能挽救清朝的败亡，却足以证明理学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相互排斥，理学家并非都是冬烘先生。

二是在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，王阳明的格心派理学发挥了极重大的作用，陈独秀、鲁迅等人在日本留学，是亲眼目睹了的。日本人的成功，足以说明，理学既可与科学兼容，也可与现代的政治社会制度相兼容。

因此，民国初期的激进派人士便达成了一种默契，彻底批判传统文化，却不公开点名批判理学。

而且有意思的是，1916年最先在《新青年》上发文提出“打孔家店，救出孔夫子”的易白沙先生，本意并非反对儒学。他是湖南人，一个标准的理学信徒，原名易坤，因为崇敬明代大理学家陈献章（人称白沙先生）而改名。就在此文发表数年后，他跑到广东陈献章的家乡，蹈海而自杀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理学虽被定位为唯心主义而加以抹黑，却很少被大张

旗鼓公开批判。因为假如要公开批判某种学说，就必须研究它，而只要有人肯用心去研究理学，就难免会上朱熹、王阳明的当。所以，对付理学的最高明办法，是先将之歪曲，然后“默杀”之。

事实证明，这种先歪曲后“默杀”的策略极为成功。今年夏天，有人在北京搞了一次不太严谨的小测验，在道旁随机问十个路人，“您知道理学吗？”其中有六个人愕然地摇摇头，有一个反问：“是礼学吗？”只有三个人说知道，其中一个能咕哝出朱熹的名字及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话头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我用同样的问题问一些热爱国学的朋友，其中多数人居然不知理学为何物；即便知道者，也是仅仅因为对王阳明的心学感兴趣。他们称王阳明为心学大师，多数都不明了他与理学的渊源。

仔细推究起来，理学现在还能冒几个泡，实在得益于日本的企业界推崇王阳明。中国的企业界人士跟风，觉得松下幸之助、稻盛和夫等人崇拜的圣贤，自己也该崇拜，所以才兴起了研读《传习录》之风。可是，企业界的那种习读不过是赶时髦，他们难知理学的精髓。人们习惯于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割裂成两段看，实是上了故意歪曲儒学者的当。

先秦儒学不很完善，也可以说比较原始。儒学讲究内圣外王，先秦儒学着力解决外王问题，内圣部分虽做了不少努力，却没有形成闭环。

宋明理学是对先秦儒学的完善与补充，到朱熹手里，儒学才真正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论体系，且将内圣与外王有效贯通了起来。

因此，现代人假如不懂宋明理学，而只读先秦儒家的原典，根本不可能全面领会孔、孟的微言大义，或者说很难读懂。

许多研习者有这样的体验：一本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精读下来，揣摩很长时间，不过得些片言只语的启示，整体上却一片混沌。

什么原因呢？一是因为现代人普遍欠缺小学功夫，对古文有些隔膜，且与古人的思维方式不对接；而最重要的是，经书的内容本身有些杂乱，缺乏逻辑性，因此找不到头绪，感觉就像面对一筐散乱的珍珠。

另一个方面，孔、孟、荀当时言及政治及社会礼法制度的言论较多，

谈论人生的学问虽然也不少，且基本具备了理论体系的雏形，却仍相当隐晦不明。因此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上，听孔夫子等人站在封建宗法社会的立场上讲话，难免会被儒家的外壳所眩，而忽略了它内里的真精神，从而满腹疑虑，产生出许多疑问，例如：

1. 儒学是从封建宗法社会中来的，现代社会能与之相兼容吗？
2. 儒学在现代，能解决我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问题吗？

所以，将先秦儒学与理学撕裂开来，只重视先秦儒学，而忽略宋明理学，是我们现代对待儒学的一大误区。没有理学，儒学是原始而残缺不全的。也就是说，理学包含了先秦儒学，而先秦儒学不完全包含理学。

假如我们能客观地看待理学，就会发现理学只不过是近代遭受了一些小挫折，它根本没有衰落，它其实仍旧生机勃勃。

二

理学在近代受挫，实际上是代人受过。

中英鸦片战争之后，朝廷腐败无能，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，有些人认为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僵腐了所致，其实完全是个误会。

西方人欺负清朝时，清朝已经开国二百年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，能在延续二百年后仍健康活泼。清朝经过康乾盛世，到鸦片战争时期，已经暮气沉沉，百病缠身；即便西方人不来，它也气数将尽，要改朝换代了。这是一个社会自然的盛衰循环规律，非人力所能抵御。

西方人带着工业文明的气息东来，给清朝带来的不是危机，而是机遇；因为西方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及贸易方式，能打破传统的财富增长极限，能疏解清朝社会内部积累起的各种矛盾。假如清廷应对得当，它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能跳出盛衰循环律的朝代。

但不幸的是，清朝的皇族是满洲人。西方在将现代化带给中国的同时，

也把民族主义带了过来。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，它与中国社会各种积累起来的矛盾结合，引燃熊熊大火，使清朝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。

因此，清朝末年的暮气沉沉，绝不能说完全是由于传统文化造成的。清末的理学家们，搞洋务运动，积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；搞维新变法，积极引进西方的政治及社会制度，他们尽管没有成功，可何曾消极过？当然，他们的群体中肯定有人因循守旧，但那绝非主流。

另外，假如我们将眼光放大，以全球的视野观察西方的霸权扩张过程，就会发现儒家文化区在应对西方的挑战方面，算是最好的。日本自不必说，中国虽然割地赔款，受了不少委屈，但它与奥斯曼帝国、印度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相比，仍是相当成功的，代价也最小。

再近一步看，在今日全球化的浪潮中，儒家文化区仍是学习西方现代化最为成功的区域。日本、中国大陆、“亚洲四小龙”、“亚洲四小虎”，其成功的背后无不有儒家文化的影子。当然，儒家文化区也有一些国家例外，但那些例外，无不是排斥传统文化所致。

世间的学问知识可归为三类，一是自然科学，二是解决社会问题之学，三是解决人生问题之学。自然科学可以不断进步，社会之学可以与时俱进，但人生之学却亘古难变，因为人的肉体及性灵，从古到今都没有变。

这也可以解释，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昌明、社会进步，而古老的宗教仍旧不衰，因为宗教作为一种人的精神食粮，就像米谷对于人的肉体一样重要。

我们中国社会可以拿来西方的科技，也可以拿来西方的社会制度，但很难拿来西方的人生之学，因为西方的人生之学根植于基督教文化之中，我们要想拿人家的人生之学，需要先拿来人家的基督教文化。

有人说当今中国最成功，也最失败。成功之处在于政治稳定、经济发展；失败之处在于精神空虚，信仰错乱，道德破产。那么，怎么拯救这可能大坏的人心呢？当今无非有三个药方，一是恢复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唯物功利主义那一套，二是拿来基督教文化，三是复兴传统文化。

假如权衡这三个药方，复兴传统文化无疑是最容易，也是最合适的。

其一，它浸润我们数千年，已沉淀于我们的每个细胞之中了；尽管新文化运动之后，它的株干已被砍伐掉，但它的根须仍活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国家近些年能够经济腾飞，它的功绩不容忽视。

其二，它能让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延续数千年而不断统的文明古国，足以说明它有它的伟大价值。

其三，西方文明对进步的狂热追求，明显是反自然律的；中国跟在他们的后边疯狂，早晚会迷失方向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不仅要积极学习西方，还需要超越西方，不盲从西方。

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，他认为：西方的意志是往前的，所以要戡天役物，发明飞机、大炮，实行民主制度。印度的意志是后退的，努力寻求解脱于轮回。中国的文化是在两者之间，主要关注人间社会的和谐。三大文化主流，西方是前进的，印度是后退的，中国是双行的。中国文化太过早熟，年轻时要向前，不走西化的路，将不能在现实世界中立足；但西化到一个地步，就必须转向，因为它不能解决人间社会和谐的问题，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巨大的贡献。但人到最后，必须面对生死的大限，所以需要转向印度文化。（本处关于梁漱溟的观点，引自刘述先先生的《现代新儒家的三代四群说》一文，文字稍有加工。）

在中国恢复儒学，实际上已为大势所趋，其他选择可能都靠不住。

儒学的核心之一，是人生之学，它不是宗教，却胜似宗教，它是一种能够强健人类心灵的智慧。这种人生智慧表现出的精神，构成了我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。

这种价值观、人生观在农耕社会，可以延伸出一套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外壳，如礼乐制度、政治制度等；它在工业社会，照样可以延伸出一套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外壳。我们现在看待儒学，绝不可被它封建的古老外壳蒙蔽了眼睛。

当然，儒学在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中，可能会有些不适；但这种不适

将是短暂的，因为实践已经证明，儒学基本不排斥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制度。

三

读西方的学术著作，大致总能找到它们的思想线索，把握其脉络，甚至能看出一个清晰的思想理论体系；可是读儒家经典，却找不到这种感觉。据此许多人认为，中国的圣人不善于线性的逻辑化思维，他们受《周易》的影响过重，习惯于用“类比”的风格说话；因此，儒家的思想是散乱的、晦涩的，不可从整体框架处理解，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次序构造。

这种看法纯属一种偏见。

儒学从一开始发展，就有一定的次序与线索，只是因为它过于精深博大，中途遇到困难，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线索隐断，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。

到宋朝时，儒学发展到了理学阶段，那条中断的线索又被重新寻出，发扬接续，终于在朱熹那里贯通内圣与外王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。

这个庞大而细致的儒学思想框架虽然尚不够完善，但它隐然有明晰的逻辑次序；相较而言，它可能比康德、黑格尔等西哲们的思想还易理解。

有一些人虔诚地读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，抱怨说读不懂。我告诉他们读不懂就对了，瞎子摸象怎可知道什么是象？因为读王阳明不能不读陆九渊，读陆九渊不能不读朱熹，读朱熹不能不了解北宋五子，了解北宋五子不能不读孟子，读孟子不能不读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与《论语》。

王阳明处在儒家学术的下游，他的许多话都是针对上游而说的；所以关起门来读《传习录》，读不懂正常，即便宣称自己读懂了，一般也是假懂。

同样，《论语》也是一本被热读的儒家经典。《论语》表面文辞简浅，

实则几乎每个字都有深意，所以从中读出点“心灵鸡汤”类的感悟容易，而要读懂其大义则难。

如果单纯读《论语》，只能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要想深一步，达到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的境界，需要下很大的功夫。当然捷径也有，那便是从理学入手，只要理学熟了，就能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而如果再进一步，理学通了，就能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王阳明当年龙场悟道成功，自言回味圣人的言论，与自己的体认无不契合，便是达到了这种境界。

然而，理学本身极其庞杂，一般学习者若想摸到其门径，仍然非常困难。据有人统计说，只朱夫子一人留下的文字，就有数百万言，实在令人望而生畏。

笔者不揣浅陋，试图通过探讨理学源流的方法，用简约的文字，将儒学的理论体系勾勒出来，以便让读者顺着头绪，用最少的时间与精力理解儒学的精髓。

可是鉴于笔者学术功力有限，难免有不严谨及疏漏之处，望中外方家不吝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前 言 理学，一门被严重误解了的学问 / 01

第一章 理学在现代中国复兴的根基 / 001

第二章 传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隔膜 / 009

第三章 从孔子到曾参 / 017

第四章 传说中的思孟学派 / 025

第五章 荀况的现实主义 / 035

第六章 天人三策与董仲舒 / 043

第七章 儒道两栖的奇人陈抟 / 051

第八章 邵雍的先天象数 / 059

第九章 张载的浩然之气 / 067

第十章 出污泥而不染的周敦颐 / 075

第十一章 洛阳二程 / 083

第十二章 洛学南去 / 091

第十三章 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 / 099

- 第十四章 陈、朱义利王霸之辩 / 143
- 第十五章 陆九渊的心学 / 153
- 第十六章 北方大儒许衡 / 179
- 第十七章 南方大儒吴澄 / 187
- 第十八章 大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 / 195
- 第十九章 河东之学 / 203
- 第二十章 江门之学 / 211
- 第二十一章 阳明之学的魅力 / 221
- 结 语 理学在现代的使命 / 271

理学在现代中国复兴的根基

理学这一古老而庞大的思想意识大厦，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就被推倒了；新中国建立之后，为了给马克思主义腾挪地盘，它的断壁残垣又受到清肃，遗迹几乎荡然无存。以至于现在我与朋友们谈论起它，往往要用很大的劲，才能让一些人恍然忆起，仿佛忆起家中一件印象模糊的无用老古董，朱熹、王守仁这般贤哲的名字，也已封尘日久，陌生而遥远了。

去年冬天的时候，我回老家，与一位近九十岁的长者闲聊。他在民国时读过私塾，现在是个乡村基督教会的讲经人。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基督教，但当我无意间提到朱熹这个名字时，他肃然起敬，脱口接了句没头没脑的话：“朱夫子啊，圣门的学问过时了。”这是多少年来，我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听到有人还尊朱熹为“夫子”。

但就像树被砍了，泥土中还留着树根一样。理学的上层建筑虽然已不复存在，但其根须还留在山野乡村与街巷市井间，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。“讲道理”、“伤天理”、“问良心”这类口头禅，依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惯常用语；“尊师敬长”、“好好学习”、“勤奋节俭”等传统观念，依旧是我们某些家庭教育子女的金科玉律。

中国在西化的道路上疾行了一百多年，表面上似乎已全盘西化——

无论是衣着、生活方式，还是思维及行为习惯，都已经与欧美没有多大区别——但假如把一个普通的中国人（极端西化了的“香蕉人”除外）与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放在一起观察，还是能慢慢发现他们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。这些差异不在于体貌、语言等种族特征，而在于文化背景——欧洲人的文化背景是基督教，而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是儒家传统，确切地说是儒家的理学传统。

早在19世纪的时候，欧洲的一些哲人便发现了中国的特别之处，其中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·威廉·约瑟夫·冯·谢林的看法最具代表性，他说：“全球大约生活着十亿人^①，其中三亿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。其余的人类在漫长的文化发展道路上，向西方与北方迈进时，逐渐分化为各个不同的民族，而在亚洲最东部的中国，却呈现出一个稳固的整体，它幅员辽阔，不受任何外来影响；它孤芳自赏，与众不同。这使得它成为一个与其他散居的民族迥然不同的第二人类。”

这个当时看起来“颓落、平庸、迂腐和干巴巴的形式主义”的第二人类，在谢林看来，有着两个醒目的特征。

第一，它的历史悠久而连续，简直就像史前状态的一具木乃伊。他说：“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帝国都消失了，亚述、米底、波斯、希腊和罗马等帝国早已没落。然而中国，却像不知其源头的河流，始终在从容地流淌着，在千百年这样漫长的岁月中，竟然丝毫没有失去光彩与威严。”

第二，它彻底的非宗教意识。谢林说：“在众多同样古老的民族中间，中华民族是个绝对没有神话的民族，它的发展仿佛完全脱离了神话运动，而转向了人类生存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面。对于许多国家和民族，神话过程发挥了巨大的威力，而唯有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、独特的例外。”

“事实上，在佛教传入之前，中国没有僧侣，即便翻遍中国最早的文籍，也找不到任何表示僧人的文字与符号。中国原本是一个根本没有

^① 据意大利人口学家马西姆·利维巴茨估计，公元1880年时，全球的人口规模为9.54亿。

僧侣或者说绝对非僧侣化的国家，要确切把握中国的特性，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。”^①

对于西方人而言，这两大特征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，即：一个没有宗教意识、缺乏终极关怀的民族，因何没有堕落入狂纵或虚无的泥潭，反而生生不息，持续了数千年仍没有丧失掉生机？

其中的原因，无论在西方，还是在中国，本不是什么秘密——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是非宗教的，但它提供的那套价值观念，却像基督教提供的那套价值观念一样，能够滋润强健东亚人的心灵。

然而，这种不是秘密的东西，却让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感到无比困惑。因为我们认定，老祖宗创造与坚持的那套东西虽好，却不能与现代化社会兼容，它过时了。

在晚清的时候，张之洞等一批士大夫，曾设想把西方的知识、技艺与中国的道德传统相嫁接，谓之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但这种主张过于模糊，因为它可以解出三种不同的含义：1. 以传统的精神道德为体，政治制度、礼法制度都可以学习西方；2. 以传统的礼法制度与精神道德为体，政治制度可以学习西方；3. 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、礼法制度及精神道德为体，只学习西方的技艺。

张之洞在公元1898年提出这一主张时，他的身份是清朝的封疆大吏，因此他所明说的“体”字，只能是第三种含义——维护清朝的君主制政体、传统礼法及旧有道德——尽管他可能在心里认同日本人“东方道德，西方技艺”的主张，但万万不敢说破。

梁启超曾著文嘲笑张之洞，说他宣扬这种观念的书，“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，为尘埃野马，其灰其尘，偶因风扬起，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”。

事情不幸被梁启超说中，仅过了二十年，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，陈独秀、胡适之、鲁迅等一班文艺健将们，连中国的“体”也不

^①以上关于谢林的话，皆引自他的演讲论文《中国——神化哲学》。参见《德国思想家论中国》第134—173页，（德）夏瑞春编，陈爱政等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第一版。谢林生于公元1775年，死于公元1854年，黑格尔给他这位朋友贴的标签是“客观唯心主义者”。